

家园与土地：文化传承中的《告别马焦拉》

刘亚丁

(四川大学, 成都 610064)

摘要: 瓦·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学术界得到了较大的关注, 但尚有研究的余地; 本文通过对作品词意和文本的分析阐释, 揭示了土地与家园主题在该小说中的建构方式; 通过梳理拉斯普京的创作历程, 描述了他的土地与家园主题的三部曲; 家园和土地在俄罗斯文化中是一个比较大的母题, 拉斯普京是这个母题的最有力的传承者之一。

关键词: 拉斯普京; 土地; 家园; 阐释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

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瓦连京·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有着广泛的影响, 他对土地、家园与科学技术关系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达, 应该成为今天人们关注反思类似问题的宝贵经验。拉斯普京 1937 年出生乌斯奇—乌达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该镇刚好位于安加拉河畔, 伊尔库茨克与布拉茨克的中间。1954 年考进伊尔库茨克大学历史—语文部, 当时他的理想是当教师, 没有料想后来在文学方面会有所发展。为生计到地方报纸《苏维埃青年》打工。1959 年大学毕业后, 在大的建筑工地做特派记者。1961 年开始写小说, 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拉斯普京的代表作有《为玛丽娅借钱》(1967)、《告别马焦拉》(1976)、《活着, 可要记着》, 《失火记》(1985)、《农舍》(1999) 等。他先后获得过苏联国家奖、莫斯科—彭内奖的头奖、索尔仁尼琴奖等奖项, 是当今俄罗斯的大师级作家。1976 年拉斯普京在《我们同时代人》第 11、12 期连载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

《告别马焦拉》讲述一个马焦拉岛和岛上居民在一个夏天的命运。马焦拉村是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上的一个小岛, 三百年来岛上的农民祖祖辈辈靠种庄稼为生。饱经风霜的马焦拉本来像奔腾的河水一样永无休止, 将永世长存下去, 可是在小说开始时它进入了最后一个春天: 国家计划在安加拉河下游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 大坝挺立, 大河小溪水位都将提高, 溢出两岸, 要淹没许多土地, 马焦拉岛也在其列。小说讲述了马焦拉岛上几辈人在搬迁前的情绪、心理和行为。

一天达丽娅老太太在家里和好邻居纳斯塔霞和西玛喝茶闲聊, 寄居在村外营棚里的流浪汉鲍戈杜尔突然跑来报告了一个坏消息: 村外坟地有人在砍十字架。达丽娅立即带着老姐妹赶到坟地, 看到有两个人将坟墓的坟桩、栏杆和十字架全都锯下, 正准备一把火烧掉。达丽娅使出浑身力气冲上去, 用拣起来的棍子击打其中一人, 她哭号着咒骂“掘别人祖坟”的人。鲍戈杜尔从村子里叫来了好些人。他们一起将这两人押到了村子里, 原来的村苏维埃主席、现在的新镇苏维埃主席沃龙措夫和政府代表茹克向他们解释道: 他们是在执行关于水库

库底卫生清理的决定，放水前要清理好水淹地区的地面。他们遭到村民们的围攻，最后狼狈离开。达丽娅带着姐妹们把坟地的十字架和坟桩重新竖起，一直忙活到深夜。

年轻人很容易跟马焦拉分手，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说：“早该淹了。没点活气……都不像人了，都成了臭虫和蟑螂。”（拉斯普京 1982：56）她一直等着却没有等到时机烧掉自己祖传的房子，好领到国家的折价费。她的房子两面都连着其他人住的房子，因此人们制止了她，她咒骂马焦拉村和那些死抱着村子不放的马焦拉人。她威胁要点火烧房子。卡捷琳娜老太太的儿子彼得鲁哈早就是个不成器的光棍，一天夜里他喝醉了酒，逼着母亲搬走，母亲只好到达丽娅家去住。她安顿下来，刚刚才入睡，鲍戈杜尔就来敲窗户：卡捷琳娜家着火了。等到卡捷琳娜赶回时，房子已经被烈焰吞灭。彼得鲁哈在人群里窜来窜去，竭力想告诉大家，他睡觉时被烟呛醒了，差点被烧死。大家心里明白，就是他自己放火烧的。

在割草季节开始的时候，马焦拉村的生活再度沸腾起来。已搬走的半个村子的人都回到了马焦拉。人们干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好久没有体会这样的情绪了。每到晚上大家总是到街里聚在一起，知道这样的夜晚所剩无几了。彼得鲁哈也回来了，他领到了一大笔折价费，却只给了纳斯塔霞 25 卢布。达丽娅家也来了客人，巴威尔的儿子安德烈回来了。安德烈原来在部队当兵，复员后进了一家工厂，现在从工厂辞了职，准备找新的工作，现在回来看祖母。正好下起了大雨，不能出去割草，巴威尔和安德烈在家里喝酒。安德烈说他打算到安加拉河的筑坝工地去工作。达丽娅很生气地责备他：你要放水来淹我们？

两个外来人奉命清理库区地面，他们到处放火烧房子。一天傍晚他们来到“树王”——一棵巨大的松树跟前，其中一人想试试它，抡起板斧用斧背猛然一击，斧子被猛烈弹开了，险些飞出手去。他想用斧头砍些树屑下来，无奈斧滑溜得出奇，陡然铮铮作响，丝毫不能伤及树基，只是在表面留下了一道道斧痕。另一人则将汽油泼在树干上，擦着一根火柴，或立刻燃起来，火舌包围了树干。他们以为完成了任务，放心回去吃饭睡觉。可是第二天他们发现大树安然无恙。中午来了五个人，他们用斧头，用油锯，用火，都奈何它不得，只好悻悻离去。

放火的来到达丽娅家门口，达丽娅赶走了他，让他明天再来。达丽娅找来石灰浆把房子粉刷了一遍。这座她自己在里面住了一辈子的房子，怎么能够不给以像样的装裹就让它死去呢？她达丽娅可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临到自己的房子被烧之前，就像与亲人永别一样，不能让它衣冠不整。离开时她告诉放火的只准在外面烧，不能进屋。

岛上的房子全部烧光了，只剩下了鲍戈杜尔栖身的营棚。达丽娅、卡捷琳娜、西玛和她的小外孙，他们都不愿离去，只好借住到鲍戈杜尔的营棚遮风避雨。放火的人临离开时让鲍戈杜尔自己烧营棚。巴威尔见母亲达丽娅不肯离开，只好答应过两天来接他们。纳斯塔霞从新镇回到了马焦拉，她也到了营棚。她对达丽娅她们说，叶戈尔到新镇后天天不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听收音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

巴威尔回到新镇的家里，彼得鲁哈和沃龙措夫来找他。沃龙措夫听说达丽娅他们还没离开马焦拉岛，营棚还没烧，他立刻慌了神：国家委员会明天就要来检查，他给他们看没烧的营棚，看拖延撤离的人？他决定自己带着巴威尔和彼得鲁哈星夜返回马焦拉岛，去处理遗留问题。他们三个人找到汽艇，让司机加尔金驾驶着向马焦拉岛驶去。汽艇在夜间的浓雾里迷了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马焦拉岛。彼得鲁哈大声呼喊母亲和达丽娅大婶，没有回应。加尔金终于失去了驶出迷途的希望，熄灭了汽艇的马达。

二

《告别马焦拉》在不论是在苏联和俄罗斯，还是现在中国的学术界都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小说发表后立刻在读者和批评界引起了强烈兴趣。《文学问题》编辑部

1977年组织了圆桌会议来讨论这部作品。是年第2期《文学问题》在《瓦连京·拉斯普京的新小说》的总题目下发表了O.萨雷茨基《家园和道路》、B.奥茨科斯基的《告别是否太久长》、Ю.谢列兹廖夫的《土地，还是领地？》、A.奥甫恰连科的《问题的真实性》和E.斯塔里科娃的《我们关注生活》等5篇文章，就拉斯普京的创作中的农村题材作品主题的演变，就小说《告别马焦拉》的思想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被《文学问题》杂志作为集中讨论的对象，在那几年中有邦达列夫、贝科夫、利帕托夫、特里丰诺夫等的作品，这表明了《告别马焦拉》在当时的影响程度。

O.萨雷茨基的长篇论文（32页！）《家园和道路》对《告别马焦拉》是持保留态度的。该文在苏联农村题材文学的大背景下，全面回顾了拉斯普京的创作道路，分析了他的《最后期限》中的主人公安娜形象的价值。他认为“家园是拉斯普京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拉斯普京的力量和弱点都集中表现在家园主题中。”（O.Салынский 1977：29）《最后期限》中的安娜体现了家园的主题。在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到，在思想观念和术语运用中，萨雷茨基借用了列宁评托尔斯泰的一组文章的基本精神。后来的具体分析更是如此，萨雷茨基认为，在安娜的生活中不但体现了平静的特征，而且体现了某种“不动性”。这也隐含了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不动的东方”的不赞同的态度，已经令人觉察出了某种政治批判的意味。文章转到《告别马焦拉》时一开始分析达丽娅面对马焦拉被毁的命运时深深的自责，“干吗没有希望？干吗没有未来？是不是因为达丽娅认为自己是人类最后的一位？是不是因为在她看来马焦拉祖宗之外的，在马焦拉之后余下的都是不人道的，毫无希望的？在达丽娅的想像中，良心、记忆、家园随着马焦拉人的迁移，将不复存在。”（O.Салынский 1977：29）马焦拉人的“不动性”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中，“移居”——就意味着“趋向死亡”。于是萨雷茨基明确表态：“死亡？也许不是死亡，而是新生。在这里不能同意《告别马焦拉》的作者，他很容易自我排除在任何价值进步的支持者之外，限于个人命运而不能自拔。”（O.Салынский 1977：30）他指出，达丽娅在“世界末日”发现的“真理”不是人民的智慧，而仅仅是对人民智慧的模仿。

B.奥茨科斯基的《告别是否太久长》与萨雷茨基的倾向基本一致，萨雷茨基更注意开导达丽娅们，使他们不至于被时代彻底抛弃，同时奥茨科斯基也更关注科技革命的意义。他写道：“拉斯普京是足够严肃的作家，显然不需要对他说明：在当今的科技革命时代计算机是人类所必须的，正如在第一次工业转折时代蒸汽机之必须，电总是优越于煤油灯，更不用说优于松明了。当然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涉及的不是应不应该建水电站，值不值得淹掉马焦拉岛，涉及的是建设所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有没有无需论证的永恒的崇高价值等问题。”（B.Оскоцкий 1977：40）奥茨科斯基引用马克思关于进步的辩证法的观点，然后谈道：“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进步都不仅意味着获得，也意味着失去——这一历史辩证法加强了艺术思考的哲学潜力，促使艺术思考达到极大丰富的途径。可是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恰恰是在艺术思考的哲学基本方面暴露了其弱点。”（B.Оскоцкий 1977：42）他认为，在小说中统帅一切的是达丽娅对事件的认识，对生活的把握，它们又是很有局限性的。作家没有设定可以同达丽娅对比、可以突破她的局限性人物，她的儿子巴威尔也好，孙子安德烈也好，都不能与之并立，因而无法突破其局限性。

在审美效果上，奥茨科斯基也指出了《告别马焦拉》的“局限性”：他首先转述了小说中达丽娅粉刷老屋以永别死者的方式郑重地告别自己的家、她悲伤地告别父母孩子的坟墓、村子里人们对坟地遭辱的强烈反应等情节，然后指出：“在这些场景中，悲剧气氛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几乎达到了沸点，但在小说的全局中，悲剧性是不足的。不得不支持这样的看法：悲剧的人为色彩是明显的——马焦拉被毁被设定为某种与全球大洪水和宇宙大火相似的形象。同时神话学和象征诗学不符合拉斯普京的天赋，它们使作家转向对他来说陌生的、非天性的因素，甚至以文学相似物来充当文学。”（B.Оскоцкий 1977：44）他的下一段否

定性评价，是针对小说中被作家称为“岛主”的那只猫、“树王”以及大雾掩盖一切的象征性的结尾的。思想意义的批判性评判完成了，审美风格的否定性分析也大功告成，奥茨科斯基以一个问题来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达丽娅同马焦拉的告别是不是太久了？”（В.Оскоцкий 1977：49）回应了他自己的题目，实际也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Ю.谢列兹廖夫的《土地，还是领地？》的倾向与前面两篇不同，对于《告别马焦拉》的首肯赞扬溢于言表。谢列兹廖夫首先同前一位发言人奥茨科斯基争论道：如果仅仅把拉斯普京的小说看成是叙述具体现实事件的艺术纪实——如某块地段，某个村落，某个岛子之类，那么可以同意奥茨科斯基的说法，作家从非悲剧的情境中勉强挤榨出了悲剧。可是谢列兹廖夫从普希金的叙事诗《青铜骑士》入手讨论了国家（以彼得大帝为代表）和个人（以叶甫盖尼为代表）的矛盾。他认为，在那部作品中，被十一月的大洪水冲毁了家园的彼得堡小官吏叶甫盖尼，迁怒于倡导建立彼得堡城的彼得大帝，他对塑造彼得大帝的青铜骑士雕像发狠动粗。突然间青铜骑士雕像怒不可遏，策马追赶已然发疯的叶甫盖尼，后来叶甫盖尼死于非命。谢列兹廖夫指出，在这样的框架中可以看出《青铜骑士》的悲剧性，但是在拉斯普京的小说中结构完全不同，因为他的小说中既没有“国家意志”（它已被“干部”掩盖了），也没有主人公的个性。不是因为作品中没有个人，而是因为作品的一号主人公是马焦拉。他认为：“如果按照体现全民的福祉的国家的目的要求淹没马焦拉岛，要将马焦拉人迁往其他城镇——自然对马焦拉的老居民中的多数人而言正剧或许是的，但还不是悲剧。淹没父辈和祖辈坟墓的必要性自然也是正剧性的。自然，依然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从这件事也还是看不到悲剧性。然而当着亡故者儿辈孙辈的面毁坏坟地呢？还是个人性的事件？固然是个人性的，恰恰是透过这种个人性的东西，拉斯普京看到了悲剧性因素，这种悲剧性因素已远远不是个人性的东西了。”（Ю.Селезнёв 1977：50—51）

谢列兹廖夫提出了最重要问题：土地与人的关系，他指出：“土地与我们是什么关系：是生身母亲还是后娘？是土地养育了我们，还是它仅仅是‘领地’？我们记得恰恰是拉斯普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出生在马焦拉，我爸爸也生在马焦拉，我爷爷也是，我是这儿的主人’，叶戈尔老爹这样说，‘这土地是属于大家的，属于在我们之前的人，也属于在我们之后的人，你能创造什么？’——这是达丽娅大婶的声音，更准确地说，这是人民——土地的主人和捍卫者的声音。这声音不会‘悖逆’国家的意志，因为它体现了他们的利益。这声音反对的是体现‘旅游者式的’对土地的冷漠的态度。对持这样的态度的茹克来说，湖——并不是湖，而是‘库区’，岛——并不是岛，而是‘水淹地区’，土地——并不是土地，而是‘领地’……因此人——并不是人，而是‘水淹区公民’……因此我们面前展开的不是‘小个茹克’同人民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是两种意识、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假如将土地视为领地，就会对它采取相应的态度。对土地，亲爱的土地、祖国，可以解放她。对领地，可以占领它。面对土地可以做主人；面对领地，却只能做征服者、占领者。那个持‘这土地是属于大家的，属于在我们之前的人，也属于在我们之后的人’的态度的人不会说：‘我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那个视土地为领地的人，不会对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东西感兴趣，他必定会采取任何手段和轻慢的态度来完成既定的任务，哪管它‘洪水滔天’。”（Ю.Селезнёв 1977：55—56）因此谢列兹廖夫不同意萨雷茨基和奥茨科斯基的说法，认为《告别马焦拉》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今天看来，谢列兹廖夫提出的对待土地、对待人的两种态度，依然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资深批评家、美学家 A. 奥甫恰连科发表了《问题的真实性》，与谢列兹廖夫相似，他也对《告别马焦拉》持肯定态度。他指出：“我觉得，拉斯普京的新小说是一部非常严肃、复杂的作品，其某些局部甚至会引起争论。它促使人们深思。它证明作家的才能在继续发展和巩固。”（Ю.Селезнёв 1977：63）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前两位发言人对这部作品的责难。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拉斯普京等作家归属于“农村题材作家”。有才能的作家都会形成

自己的始终追寻的核心问题，有肖洛霍夫问题，有列昂诺夫问题。“忠实于自己的问题，这就是瓦连京·拉斯普京最重要的品质。他以执著、狂热的执著将这一问题一次又一次推到我们面前，对该问题的解决也日益深广，愈来愈具有价值。”（Ю.Селезнёв 1977：69）拉斯普京试图将列昂诺夫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文学中的哲学思路加以继续。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问题：“拉斯普京对生活的认识有不同于肖洛霍夫和列昂诺夫的地方。他在生活中看到了挥之不去的美和毋庸置疑的严峻。也许正因为如此，作家的心因从生活中感受到的忧郁的温柔而抽搐。一个航天员在回答什么是他在地球上看到的最有力的东西的问题时说，我们的地球是美丽的，我们应该关心她，爱护她。拉斯普京也努力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并坚持不放过任何巩固人在地球上的地位的善行。这也许是一种迷信。就算是迷信吧，只要它是好的，就不要放过。”（Ю.Селезнёв 1977：71）在当时，在拉斯普京的名气还不够大的时候，像奥甫恰连科这样的资深批评家的首肯，是他继续从事创作，坚持自己为保持家园、为捍卫传统的而写作的精神支撑。

这次圆桌会议形成了两派：萨雷茨基和奥茨科斯基即以当时政府和主流媒体倡导的科技革命的精神来看待问题，而且援引列宁批评列·托尔斯泰的“不动的东方”作为精神资源，否定的气势是足够的。但是他们的批评毕竟抓住了拉斯普京创作中最要害的问题——家园，尽管萨雷茨基认为在拉斯普京的创作中包含着某种“保守因素”。（О.Салынский 1977：9）谢列兹廖夫则从肯定的角度分析了拉斯普京所提出的最重要问题——土地与人的关系。因此70年代的这次圆桌会议已经涉及到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的核心问题：家园与土地。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告别马焦拉》同样受到关注，但在研究的深度方面，未必能超过70年代《文学问题》的那一组文章。1999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的“重读经典”丛书中《重读‘农村题材’散文》一书，其中关于《告别马焦拉》写到：“广泛宣传的科技进步毁坏了人与自然的世代联系，恶化了环境。在受损的贝加尔湖岸边兴建的工业项目可能导致它的进一步污染。作家起而捍卫贝加尔湖。在拉斯普京看来，不但人与自然的理想世界开始被毁灭，而且人民的道德传统也在蜕化。”（В.Недзвецкий и В.Филиппов 1949：136—137）作者指出，拉斯普京看到了生态的恶化与人的精神道德的恶化是同步的现象，这算是独具慧眼。但总的来说，《告别马焦拉》在《重读‘农村题材’散文》中并没有占有应有的位置，该书评价《告别马焦拉》的文字只有两页，除去转述他人观点的部分，作者的评价性文字只有半页。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本大型的文学史著作中，Н.列伊杰尔曼和М.利波维茨基的三卷本《当代俄罗斯文学史》第2卷《“悄声细语抒情诗”“和农村题材散文”》一章中有拉斯普京专节，但评论他的《最后期限》和《失火记》的文字比较多，评论《告别马焦拉》只有短短的一段。该书的作者以明智的生活态度与不明智的生活态度来概括贯穿拉斯普京全部作品的基本冲突，谈到《告别马焦拉》时，作者只是指出，拉斯普京将达丽娅的孙子安德列看成是急于告别旧世界而进入未知的新世界的人，那里还有毁坏乡村坟地的人和充满恶意的焚烧队。除此而外，不置一评。（Н.Л.Лейдеман и М. Н. Липовецкий 2001：53）可以感觉到，文学史的作者并不认为《告别马焦拉》在拉斯普京的创作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近几年《告别马焦拉》在我国引起了一些学者注意，将它作为俄罗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文本，认真加以阐释。梁坤在《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指出《告别马焦拉》表现了末日论倾向，说小岛的毁灭使人想起《圣经》中的大洪水的意象，她还分析了该作品与末日论的关系。（梁坤 2003）她对《告别马焦拉》的讨论将问题推向了一个新的维度，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作品，具有较强的学术新颖性。

三

土地损益与家园存亡的主题在《告别马焦拉》中是通过艺术文本来建构的，在这些文本

中拉斯普京更多地赋予了这个主题以宗教—哲学意义。通过对俄文原作的认真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创世纪圣乐与与末日悲音的交响，既是《告别马焦拉》强劲的主旋律，更是其内在的生命悸动，作品的悲剧性在于末日悲音压倒了创世圣乐。

在《告别马焦拉》中拉斯普京坚守着家园，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根基来抗拒毁损家园的粗鲁行径。在作品中作家有意识地运用了传统文化中的字句和文本来赞美马焦拉岛。在小说的第4节中有达丽娅静观马焦拉岛的场面，这里的丰富涵蕴迄今未被读者和学者很好地领悟。

И тихо,покойно лежал остров,тем паче радная,самой судьбой назначенная земля,что имела она четкие границы,сразу за которыми началась уже не твердь,а течь.Но от края до края,от берега до берега хватало в ней и раздолья, и богатства, и красоты,и дикости,и всякой твари по паре—всего,отделившись от материка,держала она в достатке—не потому ли и назвалась громким именем Матёра? (В.Распутин 1990: 229—230)

岛子，尤其是命运所亲自指定的这故乡的土地，沉寂、宁静地横卧着。它界限分明，界限之外就不是大地，而是水流了。但是岛上从这端到那端，从水边到水边，有足够的平原、财富、美景、野趣、一切含灵之物——虽然它身离大陆，却是一切都成双作对——不正是因为这样，才有马焦拉的响亮名字吗？¹（拉斯普京 1982：45）

这是静穆的圣乐（sacred music），它实际上就是拉斯普京浓彩重墨书写的拟创世纪：这里的词汇和意象大都来自于《圣经·创世纪》，首先，将岛子称为“土地”（земля），这就与《创世纪》第一章首句联系在一起了——“起初神创造天地”（В начале сотворил Бог небо и землю），²这是开天辟地的大地。“它界限分明，界限之外就不是大地，而是水流了”（имела она четкие границы,сразу за которыми началась уже не твердь,а течь），这里的“大地”（твердь）用了一个古词，恰好也是俄文版《创世纪》第1章第7节用“上帝造出大地”的“大地”一词（И создал Бог твердь³），这就是拉斯普京塑造的伊甸园。“但是岛上从这端到那端，从水边到水边，有足够的平原、财富、美景、野趣、一切含灵之物——虽然它身离大陆，却是一切都成双作对。”（Но от края до края,от берега до берега хватало в ней и раздолья, и богатства, и красоты,и дикости,и всякой твари по паре）这里包含的《创世纪》的潜文本，它来自于耶和华对义人诺亚的吩咐：“凡有血有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都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创世纪》6：19，Введи также в ковчег из всех животных и от всякой плоти по паре,чтоб они остались с тобою в живых: мужеского пола и женского пусть они будут⁴）。至此可以发现，《告别马焦拉》中达丽娅眼前的马焦拉岛，既是光明幸福的伊甸园，同时已经暗含危机：由于与《创世纪》中的诺亚典故的内在联系，小说的这段文本隐含了对人犯罪后诺亚所存身的危机四伏的世界影射。在这幅拟创世纪的图景中，最深刻的象征是：修建水电站大坝前的蓄水，与《创世纪》上帝惩罚不义的人类的大洪水联系起来。这里不光有形象之间的直线联系。从拉斯普京反复审思当代人道德状况的持续写作来看，两种相似形象之间，带出了作家深刻的道德批判意识：土地和家园不仅被外力毁灭，更毁于人自身道德的沦丧。同时一个更富有悲剧意味的问题也渐渐凸现：大洪水到来前，保种图存成了最迫切的使命，在《创世纪》中诺亚担当了这一使命，在《告别马焦拉》中这个拟创世纪的发现者——达丽娅奶奶承担了诺亚的功能，肩负起保种图存的神圣使命。

苏联的学者已然注意到“马焦拉”这个名称的含义。谢列兹廖夫指出：“岛子和村子的名称叫‘马焦拉’，在拉斯普京的笔下这并非偶然。马焦拉（Матёра）在思想和形象方面自然是同亲缘的概念相联系的，如母亲（有大地母亲 мать-Земля 和祖国母亲 мать-Родина 等）。”（Ю.Селезнёв 1977：56）这样的联想当然很有理由，所以阿格诺索夫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实际上援引了这个说法。我甚至这样判断，在如此熟悉基督教历史的拉斯普京的笔下，

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位格演变争论不休的历史，在达丽娅与马焦拉的关系中得到了有意识的再现。达丽娅首先是一位母亲，(мать)这就与马焦拉(Матёра)有了天然的联系。另外 Дарья 这个名字可以析出词根 дар，这就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它的复数形式 дары 有这样一些义项值得注意：1. “大自然的赐予”；2. “基督教神职人员在仪式中准备的象征基督的血和肉的圣餐——面包和水”。(А.Кузнецов 2001: 238) 母亲达丽娅与马焦拉岛一样，都是大自然的赐予，同时她又与马焦拉岛一道，同基督一样成了为人类赎罪的牺牲。因此达丽娅与马焦拉岛是同一精神的两种外化形态。惟其如此达丽娅才会与马焦拉同呼吸，共命运。或许这是作家营造的“有意味的形式”，或许仅仅是我的主观推断，在这里提出，就正于方家。

作品的悲剧性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创世纪的静穆的圣乐实际上一开始就被末日的悲音所压倒。二是，保种图存的艰巨使命本来应该由年轻力壮的安德列们来承担，但是这里却只好让行将入土的达丽娅奶奶来承担。

末日悲音在《告别马焦拉》中有如下一些循环往复的奏鸣。在小说的第三节中出现了小说中惟一的戏剧性冲突场景，在这里人物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达丽娅和她的姐妹们听说，她们祖辈的坟地正在蒙受侮辱：“外来人”、“魔鬼”正在盗尸。她们跑去一看，怒不可遏：原来是有人奉命在清理坟地，将十字架和坟墓的坟桩、栏杆和十字架全都锯下，正准备一把火烧掉。《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有大海、地狱交出死者，死者第二次受审，他们都被抛进火湖里。这是小说中缺席的地狱之火，真正的火很快就要烧起。为了早日拿到赔偿金，不肖之子彼得鲁哈第一个放火烧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房子。后来又大规模地烧村子里的房子，达丽娅不准放火的人随意烧自家的房子。这个细节受到了关注。“小说的第 20 章，达丽娅努力把明天就要烧毁的老屋涂白，装饰上杉树。这是准确反映了基督教为死者涂圣油（临死前求得精神解脱和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洗身、唱圣歌和出殡的一套仪式。”(阿格诺索夫 2001: 523)

作品中末日悲音挥之不去，甚至在表现马焦拉岛上的人们劳作喜悦的场景中，也是如此。人们回到马焦拉割饲养牲口的草，搬到新镇去的人们回来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在岛上的草地上割草，嬉戏打闹，大家都觉得年轻了十岁。这是小说中惟一有点暖色调的场景。即使是在这里，悲怆的情绪也不自觉地席卷人们的心头。“割草的人们收工回村不慌不忙地走着……其余的人唱着歌跟在大车后面。一会儿唱这支，一会儿唱那支；一会儿唱支老歌，一会儿唱支新歌，但唱得更多的是那支老歌，永别的葬歌；原来人们都记得、都熟悉的这支歌，似乎正是为了这个时刻来唱的，才把它一直藏在心里……唱歌的人心里倒轻松些，可是他们唱的那意想中的葬礼上的歌像齐声发出的绝望的哀求，听来令人悲痛、难熬，连心都鲜血淋漓了。”(拉斯普京 1982: 226) 离开了家园，生命将不再有意义，在纳斯塔霞的描述中，意志坚强的伊戈尔老爹迁到新建的镇上后，很快就无疾而终。

作为对人物的内心话语的描写，在达丽娅的意识中多次出现不如一死了之的念头。前面我们说过，作为母亲的达丽娅与马焦拉是同一精神的两个外化实在，因而当她无力完成捍卫马焦拉的使命时，她暗中选择了与马焦拉共命运、同生死。她的姐妹们也心甘情愿这样做，小说的结尾非常巧妙，马焦拉村已经全部被烧毁了，其他人也全部撤离了，达丽娅、她的姐妹们、鲍戈杜尔，还有西玛的外孙柯利卡一起，留在已经彻底清场的马焦拉。在漆黑的深夜，鸡窝式的房中，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对话：“‘都在一块，就算不错了，还有什么想头呢？’ ‘就是这个孩子，得想法推出去，孩子得活下去。’西玛惊恐地、坚决地说道：‘不，柯利卡我可不放。我跟柯利卡在一块儿。’ ‘在一块就在一块吧。倒也是，离开咱们他上哪儿去呀？’” (拉斯普京 1982: 226) 从这里可以看出，达丽娅和她的姐妹们、鲍戈杜尔与马焦拉共存亡的心迹已表达得明白无误了。当然作家对他们最后的结局做了模糊处理，到这里戛然而止。达丽娅们与马焦拉共存亡的决心体现了俄罗斯旧教徒式的殉难精神。所谓旧教徒指不承认尼康主教在 17 世纪中叶推行宗教改革的信徒，他们以徒步朝圣和集体自焚等形式，坚决抵制

官方支持的这场宗教改革。⁵作品中的人物达丽娅们既然不能捍卫马焦拉岛，他们就选择与其共亡。创世的圣乐终于被末日悲音所掩盖，作品至此显现出神学意义上的悲剧意味，作者也就完成了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深刻反思。

四

土地、家园存亡的问题在拉斯普京的笔下是个恒久不变的题材。实际上我们可以梳理出他的家园存亡主题的三部曲。第一部该是他的长篇随笔《顺流而下，逆流而上》（Вниз и вверх по течению），该作品发表在《我们同时代人》1972年第6期上。随笔的主人公维克多是位年轻作家，他已经5年没有返回安加拉河畔的家了。此次乘船返乡，家乡和他自己都发生了巨变。在船上望着浩浩河面，他感慨万千：“突然维克多不无惊恐地想起：家乡的周围的几个岛子可全没啦。再也没有赫列勃尼克岛，没有别列佐维克岛，在那些岛子上，他可曾经摘过醋栗，拔过蒜头、野洋葱，他还放过马，耕过地，打过草。说淹就都淹了。大水滔天而来，高过在那些世代长存的岛上见过的最可怕的洪灾。大水以挟石裹砂、你挤我压、直冲白日的全部威势，将那些岛子吞没，压在水底。水量又不断增加，增加，席卷若干村庄，达到最高点。而今自己那曾经长满庄稼和青草的土地早已被大水久久冲刷，裹挟抛洒到四面八方，那些岛子早已在水底被夷为平地了。再没有岛子了，它们那孤儿般的空洞的名称，渐渐不再有人提到，已经去到了不可回归的远方。”（В. Распутин 1988：259—260）值得注意的是，维克多提到的两个岛子的名称，第一个岛叫赫列勃尼克岛（Хлебник），它是由 хлеб 加后缀变来的，хлеб 的义项有：1.面包，2.粮食，3.庄稼；第二个岛叫别列佐维克岛（Березовик），它也是由一个名词 береза 加后缀而来的，береза 的意思是白桦树。拉斯普京不会兴之所至随便写下这样两个名称。在作家的笔下，两个岛的象征意味是可以想象的，前者或许暗示俄罗斯的物质存在，后者不妨理解为对俄罗斯的精神生活的隐喻。它们被滔天而来的大水淹没，它们的彻底消失，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维克多在船上还回忆起搬迁前那个夏天他回家乡的情景：“在那个夏天，维克多什么故事没听过，什么场面没见过呀……战争爆发以来村子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男人们喝了告别的酒；女人们哭泣着，泪眼婆娑，最后一次铺排牲口圈和菜园子的活；孩子们既机警又怯生生地你来我往，扎着堆。”（В. Распутин 1988：263）在这篇随笔里拉斯普京为沉默者发出了声音，那些在电视或报纸的新闻报道为建设水电站、为搬迁新居而兴高采烈的人们，在这里发出了痛彻肺腑的心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顺流而下，逆流而上》里的一些主题，在《告别马焦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维克多回到新建镇上的家后，同亲人谈起水淹时的情形，奶奶愤愤不平地说：“唉，那些被淹在水里的死人可怎么办呀，他们反正死都死了，无论怎么着都行，是不是？”维克多的父亲打断她的话头，她更加气愤：“干吗不能说死人，你的奶奶也在那里躺着，我们的先人都在那里躺着。现在到哪里去寻他们，在哪个岸边？”（В. Распутин 1988：290）这个主题在《告别马焦拉》中成为了小说中惟一的富有戏剧性冲突的场面：在第3节中达丽娅、纳斯塔西霞、维拉同清理坟地的茹克和沃龙佐夫发生了直接冲突，迫使他们离开了坟地。

如果说土地、家园存亡主题在《顺流而下，逆流而上》中只是一次比较直白的现实主义的呢，那么在《告别马焦拉》中就得到了现实与象征相交织的深度再现，这在上文中已作详细分析。在世纪交替的时候，拉斯普京又推出了一篇短篇小说《农舍》（Изба）。这是家园存亡主题的又一次深刻再现。如果说在《告别马焦拉》中神性的主题是以神话寓言的方式来表达的话，那么在《农舍》中则将阿加菲娅大婶的木屋写成了一个具有人的生命和情感的存在，作家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俄罗斯文化传统旺盛的生命力。世代居住的土地因修水库要搬迁了，阿加菲娅大婶按照上级的要求将自己住了一辈子的老木屋拆下，并在新镇搭建这个木屋，这就是小说故事的主体。这就与《告别马焦拉》有了根本区别，在那里马焦拉岛上的一切，乃至整个村子“决定都放火烧掉，免得再为倒腾那些破烂费事。”（拉斯普京 1982：7）而《农舍》则是要将老屋搬到新镇复建。在新的地点重新搭建起来的阿加菲娅的老木屋，

经历了考验，它的主人阿加菲娅撒手人寰，它也曾有过孤儿般的凄惨。它也曾被“不肖子孙”糟蹋过，被酒鬼玷污过，但它最终毕竟重新抖擞精神，焕发生机。⁶ 这篇小说似乎表明，拉斯普京已经从对生态灾难和对传统文化日渐消弭的悲观情绪中走了出来。拉斯普京的土地、家园存亡主题三部曲有了一个略显乐观的结局。

五

《告别马焦拉》所关注的家园、土地等问题并不是拉斯普京独具慧眼的发现。因为家园、土地在俄罗斯文化中是一个比较大的母题，在俄罗斯文学艺术中涉及此问题的诗人作家画家更是不乏其人。拉斯普京是这个母题最有力的传承者。

13世纪出现了俄罗斯著名的历史文献《俄罗斯土地毁灭记》（Слово о погибели русской земли），与俄罗斯的其他众多的以“记（Слово）”为题的作品不同，它的主人公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俄罗斯光明、美丽的土地”，作品以充满激情的颂诗般的语言赞美俄罗斯土地上的一切，它的湖泊、河流、山川、动物、飞鸟，以及城市和教堂等等。可是后来“在这样的日子里，从雅罗斯拉夫大公到弗拉基米尔大公，再到当今的雅罗斯拉夫大公，连同他的兄弟尤利亚——弗拉基米尔的大公——全都蒙受了基督世界的灾难……”⁷ 由于《俄罗斯土地毁灭记》是残篇，到这里就中断了。本该喊出蒙古鞑靼人入侵古俄罗斯之际人民的痛苦的呼天吁地，本该出现对蒙古鞑靼蹂躏俄罗斯土地的更详尽描绘，本来题中应有之义的俄罗斯土地“毁灭”的悲剧性场景等等，都无缘与后世的读者见面。但这仿佛是一个悲剧性的前兆，《俄罗斯土地毁灭记》以土地为主人公，《告别马焦拉》也以马焦拉岛为主人公，《俄罗斯土地毁灭记》应该以国土的沦陷为结局，《告别马焦拉》也以马焦拉岛的淹没为结局，是宿命式的相似把相隔700多年的两部作品联系在一起，还是拉斯普京有意识以自己的作品回应这个历史文本，有待进一步研究。

15世纪前半叶，俄罗斯杰出的圣像画家安德列·鲁勃廖夫在莫斯科北面的著名的谢尔基圣三一教堂完成了《圣三一圣像画》（1422-1427）。画面上从左到右依次是圣父、圣子、圣灵。在画的左上方，圣父的头上绘有房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体系中对家园的人性化的表现。⁸ 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家园的形象借宗教的载体而长久与人们相呼应。

1839年H.奥加廖夫写了沁润着深挚情感的《老屋》（Старый дом）：“老屋，我的老友，我来造访你，/悲伤地望着你，/过去复活在我心里。……老朽的你颓唐呆立，/四周的灰泥层层剥落，/铅灰的云层低垂，哭泣，/好像俯视老屋在叹息。……我突然心痛，浑身战抖，/犹如我在墓地伫立。/我将亡故的亲人呼唤，/已逝者中没有谁把我搭理。”⁹ 当时26岁的奥加廖夫在这首诗中表达了复杂的个人情感。但我们如果抛开传记式的追根溯源解读法，可以感受到某种形而上的关怀，即面对家园败落或家园被毁油然而生的悲剧情怀。1842年他的一首《农舍》（Изба，注意，拉斯普京近期的《农舍》与之同题）则显得平和而抒情，全然是—幅贫苦农家的写实主义的素描画。

Г.乌斯宾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1882年1至3期连载了一组题为《土地的统治》的随笔，有《土地的统治》、《乡间日历》、《现在和从前》等。且看发在第一期上的《土地的统治》：“我觉得，这个巨大的秘密就在于，俄罗斯人民最广泛的大众至今能够在不幸中保持忍耐和强壮，至今能够保持心灵的年轻，既保持强壮而又有孩提般的温顺，总之一句话，人民——能够肩负起一切的人民，我们深爱着的人民，我们从他们身上寻求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的——至今保持着—自己的坚强和柔顺，恰恰是因为土地统治着他们。”（Г.Успенский 1988：213）这个气势磅礴的句子，将土地与俄罗斯人民的亲缘关系和盘托出。乌斯宾斯基接着转述了一个壮士歌（былина），借此讲述土地统治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渊源：基辅罗斯壮士斯维亚托戈尔（Святогор）骑着宝马漫游天下，想测测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假使我找到一个—大国，我能把整个土地扛起来。斯维亚托戈尔在路上没有碰到任何—大国，倒是碰到了

一个肩扛口袋的农夫，他催动宝马，可无论如何赶不上他。最后他叫住了农夫，农夫停下来，将口袋放在地上。斯维亚托戈尔想扛起口袋，可是他双手环抱口袋，使尽壮士的全部力气，血脉贲张，只能让口袋离地毫发，自己却当即跪倒地上接受了土地母亲的泥浴治疗。他高声问农夫：“你告诉我，口袋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农夫回答：“口袋里的重物是母亲的生土。”“你是何许人也，姓甚名谁？”“我叫米库拉，农夫，姓谢利亚诺维奇，母亲的生土爱我。”（Г.Успенский 1988：214—215）

乌斯宾斯基认为，在这个壮士歌里包含了人民生活的全部秘密。乌斯宾斯基写这样一个特写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法令，其中有关于土地的规定：农民缴纳赎金后可以得到一份土地。至于份地的面积，法令规定了最高和最低定额，如果份地超过最高定额，地主可以割去多余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割地”。这条规定就为地主掠夺农民的份地制造了借口。经过这次改革，地主平均割去了改革前农民份地的18%。到了80年代失去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加，因此乌斯宾斯基如此隆重地书写土地的统治，就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为失去土地的农民请命。平民作家乌斯宾斯基如此，贵族作家也有为土地和家园而呼吁的。

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通过贵族涅赫留朵夫的视点转述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不幸命运。在《复活》第二部第12章中，聂赫留朵夫雇了一辆马车去监狱探视马丝洛娃，车夫对他说城里的农民多得很，老板把农民丢来丢去，简直像扔刨花一样。聂赫留朵夫问他们为什么不呆在乡下，他说：“呆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土地呀。”他家自己的土地很少，原来的地主老爷又把地卖给了商人，农民根本租不到地。（列·托尔斯泰 1983：285—286）

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占有土地导致农民赤贫多有忏悔之心，“他十分清楚，儿童、老人纷纷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吃，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放牧牲口，又收不到粮食和干草。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的全部灾殃，或者说老百姓灾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因此靠老百姓劳动过活的人手里。”因此他决定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列·托尔斯泰 1983：256）

我们知道，小说里表达的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心声，他自己作出的类似的决定，导致了他和他妻子的矛盾，也导致了他晚年的出走。

1878年B.波列诺夫完成了《莫斯科小院》，画面上，春天的阳光下，一座被木栅栏围起来的木质的农舍，紧挨着它的是歪歪斜斜的牲口棚，院子里长满了青草和野花，只有从小房子门口延伸开两条被脚踏出的小径露出黄土，没有长草。一辆套好马的大车停在院子里，一个农妇打扮的妇人，提着桶从屋子里出来，四个小孩在嬉戏，两个似乎趴在地上逗昆虫，一个正欣赏摘到的野花，另一人坐在草地上号啕大哭。背景有高耸的教堂和整齐的楼房。¹⁰究竟是城市侵占了农舍的地盘，还是农民在城市的挤榨下竭力保全自己的家园？这幅作品是耐人寻味的。这幅作品现收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1902年B.波列诺夫又画了一幅同样题目的作品，整个构图也完全一样，与1878年的《莫斯科小院》相比只有一点区别：农妇和小孩没有了，马车也没有了，牲口棚似乎更倾颓了。¹¹这幅画现被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收藏。这就更让人产生遐想：在城市的扩展中，农舍似乎已不能坚守自己的地盘。事隔24年后，农舍前人物的消失，似乎意味着家园的丧失成了更确切的事实。

土地的吸引，家园的召唤，就这样构成了俄罗斯的文脉，拉斯普京在接续着这文脉。在《告别马焦拉》中对家园的恋恋不舍，对土地的眷恋，与传统文学息息相通，甚至连表述方式都非常相近。在乌斯宾斯基的《土地的统治》中突出了一个意象，这就是土地的吸引，那个壮士斯维亚托戈尔说：“口袋里的重物是母亲的生土（Тяга в сумочке от матери сырой земли）。”（Г.Успенский 1988：215）在这里“重物（тяга）”这个词有多个义项，其中包括：“向往、想望、渴望等”。在《告别马焦拉》中达利娅也两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土地在拽人哪，今天比哪天都更有力（Тянет,тянет земля,седни,как никогда,тянет）。”（В.Распутин 1990：342）这里的动词тянет，也有向往、想望、渴望等意思。对即将失去的土地、家园的向往、留恋使拉斯普京与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相联系，但他在回归传统的同时，又容纳了

时代新气息，所以有了《农舍》的稍显乐观的结局。

《告别马焦拉》将土地、家园毁损与《启示录》中的末日警示相联系的手法，在后来的俄罗斯作家那里得到了延续。1987年德籍俄裔女作家尤丽娅·沃兹涅先斯卡娅在纽约出版了俄文版长篇小说《切尔诺贝利星》，这部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为题材小说，将《启示录》与切尔诺贝利灾难相联系。在事故发生后，核电站附近，一个叫卢基扬尼什娜的老太太说：“伊戈尔老爹有本祷告的书，书上讲到了切尔诺贝利，只有那些老书上有真理。那书上说，在末日到来之前对人们会有许多预言。当中有个预言书上这样说：天使烧燃了地球上面的茵陈星。用我们的话说，‘茵陈’就是‘切尔诺贝利’。瞧瞧，连词语都不是偶然的。火花从那个切尔诺贝利星落到所有河流的源头，它们马上就变成有毒的水了。我们从楼梯爬到阁楼上，你就会看见，他们在城里吵吵些什么，要洗房子，冲地，就像冲死牛皮一样。房子里的灰尘倒是冲走了，但是有毒的水就渗到地下了，流入地下汇成溪流把周围的一切活物都会毒死。瞎忙一气，就像蚂蚁一样，上帝的愤怒用水是洗不掉的。”（Ю. Вознесенская 1987：192—193）其实在小说的扉页上，沃兹涅先斯卡娅已经把这个意思说了一遍。作家选择了两条题词，第一条是《启示录》8：10—11：“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到江河和众水的源泉上。（这星名叫茵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茵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在这部小说里，土地、家园的毁损，似乎与神的惩罚有某种联系。沃兹涅先斯卡娅原来一直在苏联从事创作活动，1980年被驱逐出国，她应该对拉斯普京的作品很熟悉，她的《切尔诺贝利星》在某些方面受《告别马焦拉》影响，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家园、土地的主题在俄罗斯文化中延续，拉斯普京作为这个主题最有力的传承者，他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新解，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这个主题的探索还将继续下去。

附注

- 1 译文不尽准确，没有把“一切都成双作对”这个体现诺亚典故的关键词译出，故引文略有改动。
- 2 Библия.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Библия для всех”,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997,Стр.1.
- 3 Библия.С-П.,1997,Стр.1. 《圣经》第一页，《创世纪》1: 7 俄文《圣经·创世纪》1: 7, 英文本、中文本此处略有不同。
- 4 同上，第6页。
- 5 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М.,1980,стр.1277,参见《苏联文学沉思录》，第99页。
- 6 参看拉斯普京《农舍》，载拉斯普京《幻象》集，任光宣、刘文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 7 Литератур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Хрестоматия.Высшая школа.Москва,1990,стр.174—176
- 8 Русская живопись X IV - X X веков.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Олма-пресс,Мосва,2002,стр.246-247
- 9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X IX -начала X X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Москва,1987,стр.313-314
- 10 Шедев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й галереи.Трилистник,Москва,2001,стр.98-100
- 11 100 лет сокровищ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998,стр.144

参考文献

- [1]Библия.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Библия для всех”,СП.,1997.
- [2]Вознесенская Ю. 1987 Звезда Чернобыль. New York, P.
- [3]Кузнецов А. 2001 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СП.
- [4]Лейдеман Н.Л. и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2001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M].М.
- [5]Литератур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M].Хрестоматия.Высшая школа.М. 1990.
- [6]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ИФилиппов В. 1999 Русская 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M].

- [7] Овчаренко А. 1977 Верность своей проблеме[J]//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
- [8] Оскоцкий В. 1977 Не слишком ли долгое это прощание[J]//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
- [9] Распутин В. 1990 Прощание с Магёрой.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2, М.
- [10] Распутин В. 1988 Вниз и вверх по течению//в сборнике «Век живи, век люби», М.
- [11] Распутин В. 1990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2, М.
- [12] Русская живопись X IV - X X веко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Z]. М. 2002.
- [13]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X IX - начала X X в. [M]. М. 1987.
- [14] Салынский О. 1977 Дом и дороги[J]//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
- [15] Селезнев Ю. 1977 Земля или территория[J]//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
- [16] 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 1980.
- [17] лет сокровищ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8.
- [18] Успенский Г. 1988 Власть земли. М.
- [19] Шедев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й галереи. М., 2001.
- [20] 符·阿格洛索夫主编 2001 20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 (凌建侯等译, 白春仁校)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1] 拉斯普京 1982 告别马焦拉 (王乃倬、沈治、石国雄译) //拉斯普京小说选,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 [22] 拉斯普京 2001 农舍, 载《幻象》集 (任光宣、刘文飞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3] 梁坤 2003 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J], 外国文学评论, 第3期。
- [24] 列·托尔斯泰 1983 复活 (草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Home and Land: *Take Leave of the Village Matela* in Cultural Lineage

LIU Ya-ding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Valentin Rasputin's novel *Take Leave of the Village Matela* has attracted great academic attention in both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but some aspects about the novel are still waiting for further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reveals the thematic construction of "home and land" in the novel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its diction and text; and it also depicts Rasputin's trilogy of the same theme with an exploration of his creative process. Home and land is a major motif in Russian culture, and Rasputin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riters in this cultural lineage.

Key Words: Rasputin; land; home; interpretation

收稿日期: 2006 - 03 - 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 NCET-04-0872)

作者简介: 刘亚丁(1959-), 男, 四川荣县人, 文学博士,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俄国文学、中俄文学关系。

[责任编辑: 刘 银]